

HUAYANG GUOZHI JIAOZHU

HUAYANG GUOZHI JIAOZHU
HUAYANG GUOZHI JIAOZHU

华阳国志

校注
修订版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成都时代出版社

如闕地也天彭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
祭用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蒲氏縣見兩山對
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王所
祭用三牲圭璧沈漬漢興數使使者祭之定水上冰乃

祭用三牲圭璧沈漬漢興數使使者祭之

冰乃所

HUAYANG GUOZHI JIAOZHU

HUAYANG GUOZHI JIAOZHU
HUAYANG GUOZHI JIAOZHU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成都时代出版社

华阳国志校注
修订版

地也
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
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蒲氏縣見兩山對
如闕因號天彭關髣髴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所
祭用三牲醴醢沈湏漢興數使使者祭之是水上冰乃
祭用三牲醴醢沈湏漢興數使使者祭之是水上冰乃
祭用三牲醴醢沈湏漢興數使使者祭之是水上冰乃

華陽國志
校注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阳国志校注/(晋)常璩著;刘琳校注.一修订版.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6
ISBN 978-7-80705-486-3

I.华… II.①常…②刘… III.西南地区—地方志—东
晋时代 IV.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858 号



华阳国志校注 (修订版)

[晋]常璩撰 刘琳校注

责任编辑:邱林

责任校对:伍登富等

封面设计:周明

版式设计:321 工作室

出版:成都时代出版社

(成都市庆云南街 19 号 邮编:610017)

发行: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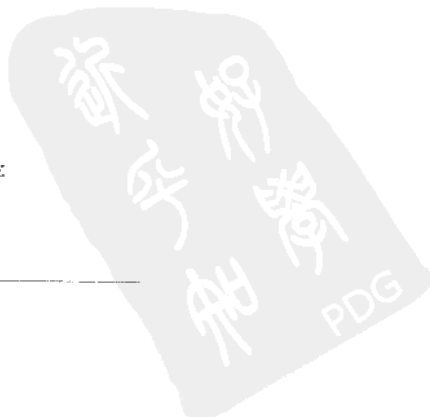
规格: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38.25 字数 793 千字

定价:80.00 元

书号:ISBN 978-7-80705-486-3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刘琳，1939年生，贵州丹寨人。四川大学教授，已退休。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留系任教。1984年调本校古籍整理研究所，曾任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史、四川古代史、古文献学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华阳国志校注》、《四川古代史》（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古籍整理学》、《中古泥鸿》、《全宋文》（主编）、《现存宋人著述总录》；整理校点的古籍有《黄庭坚全集》、《全蜀艺文志》等。以上著作中，有七项获省部级奖。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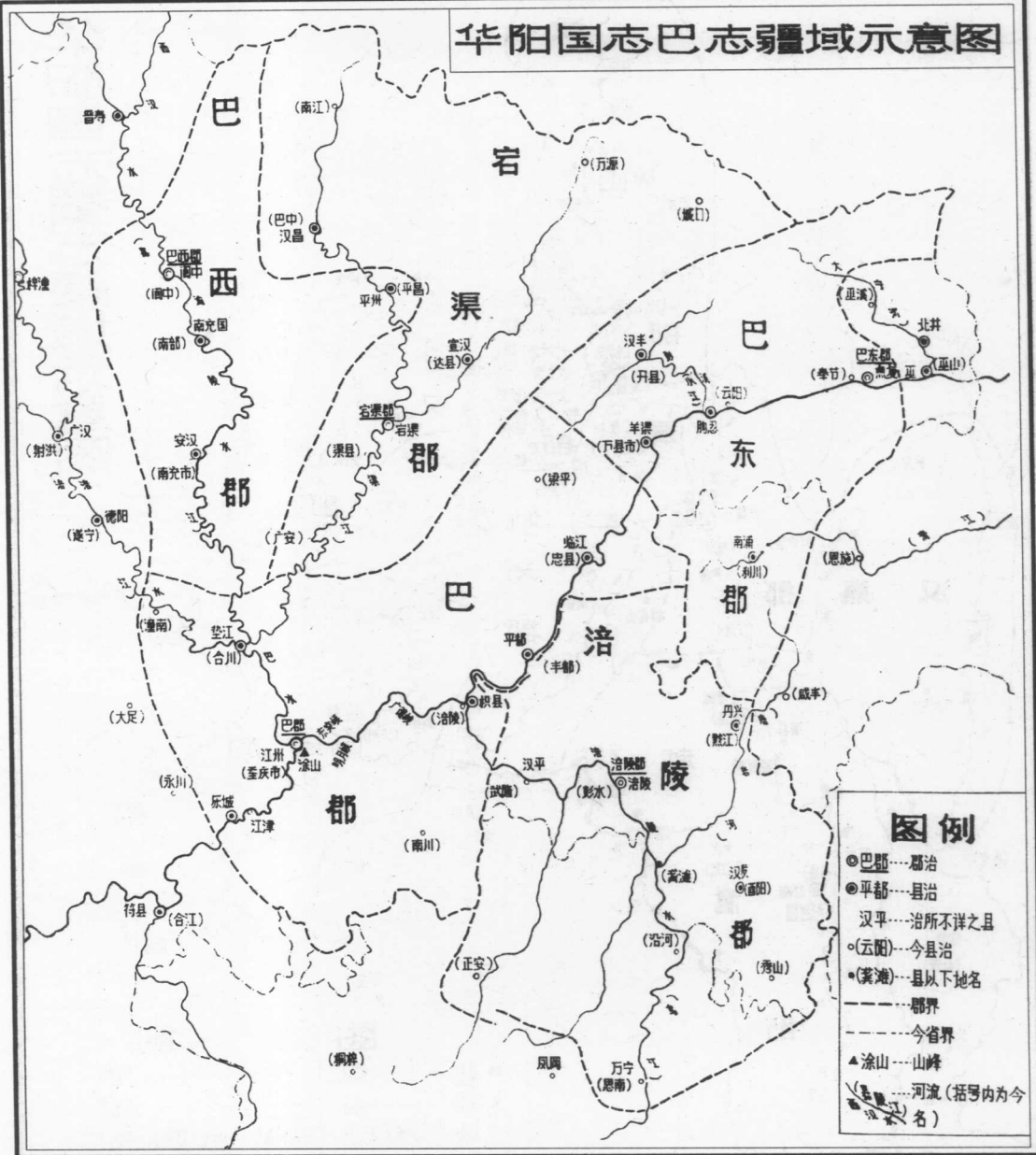
本校注本在文字校勘上以廖刻题襟馆本为工作本，参校诸本；注释上以史实的注释和考证为主，注意文字的训诂解释；同时书中附有示意地图。

修订版对原来注释中解释得太简略的历史资料有所补充，未引用原文的增引原文；原来注为“不详”的现在补充注释，注释不确的予以改正；对一些古地名的今释重加解释；另外对词句的训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对文字的校勘也有一些新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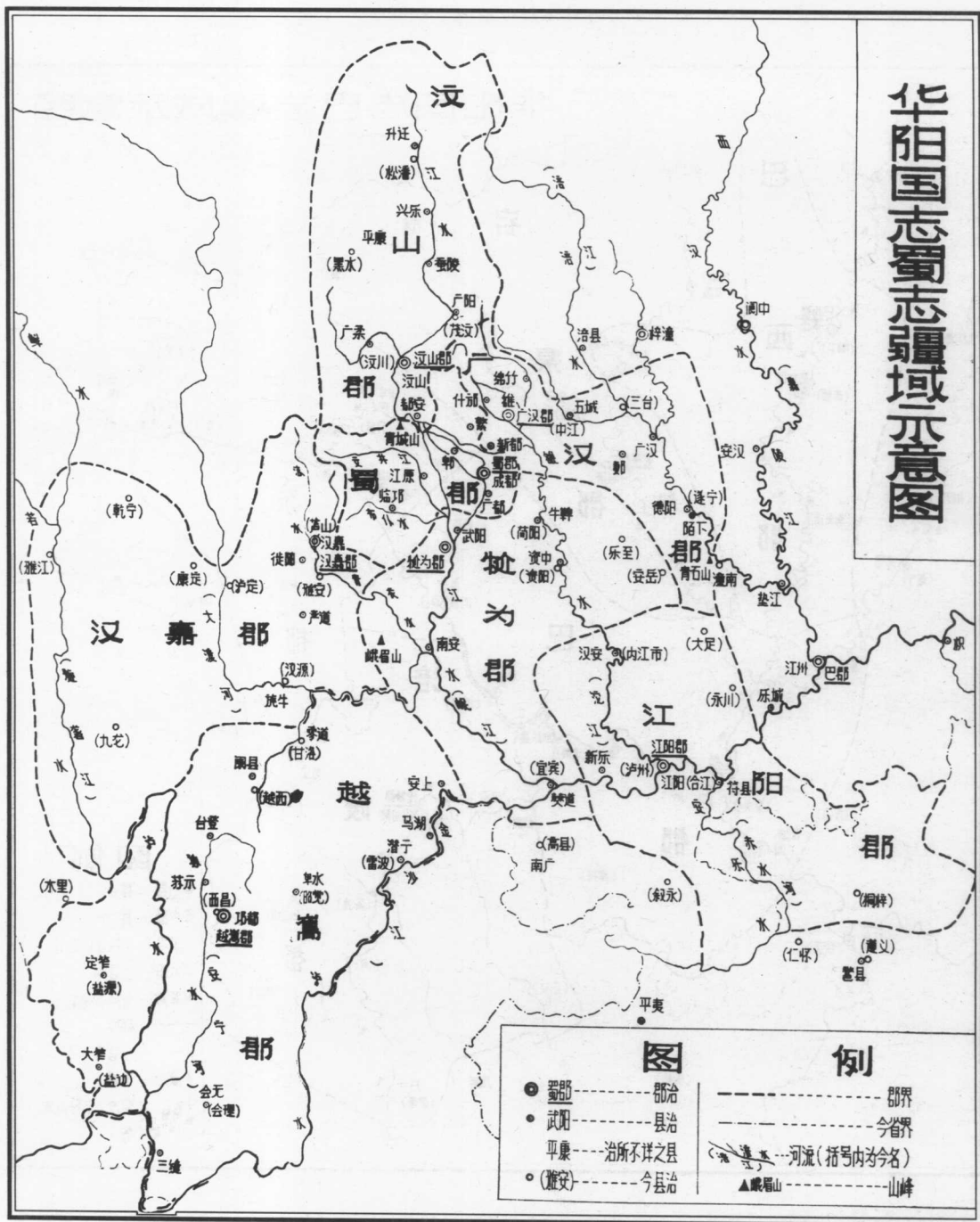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邱 林

封面设计 / 周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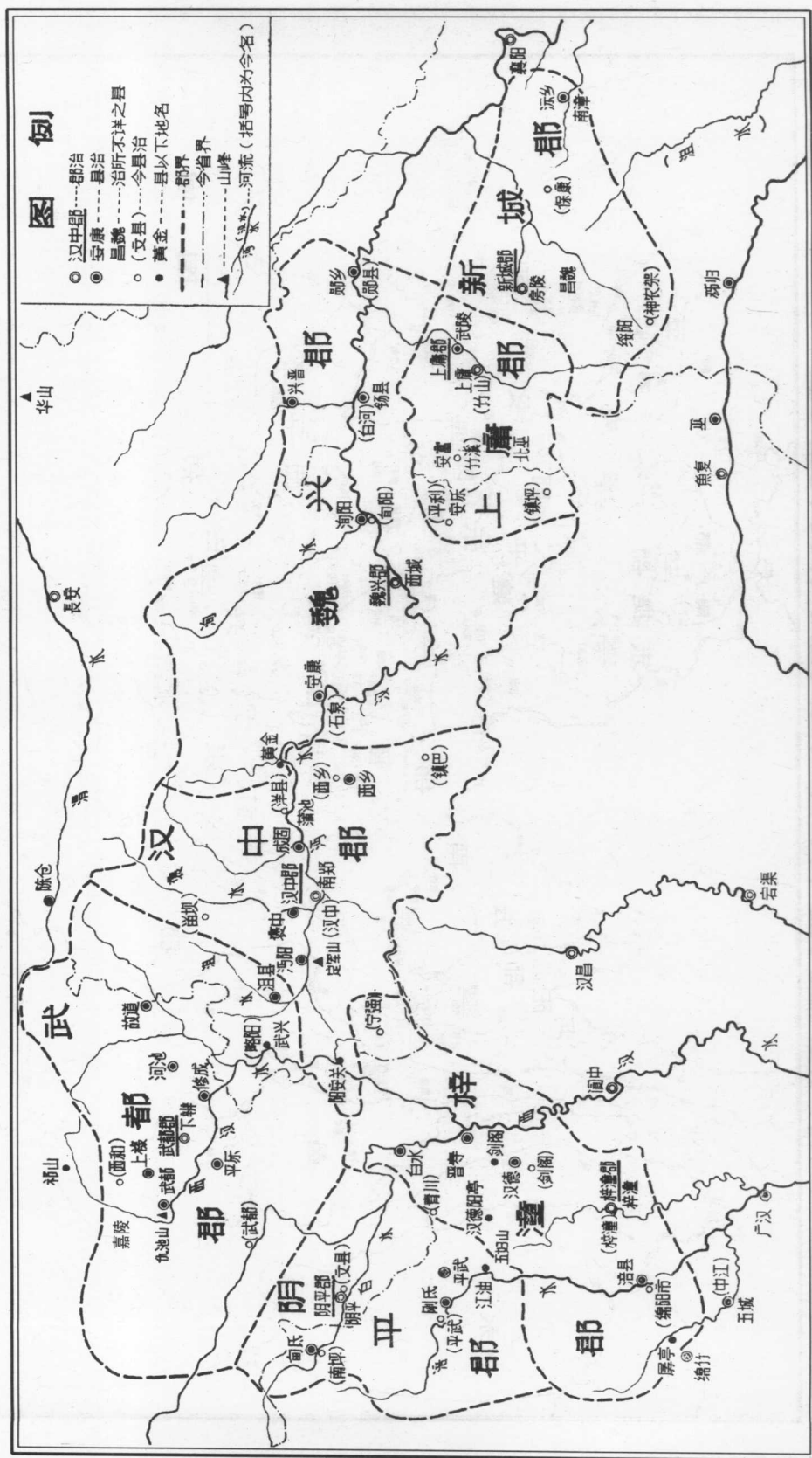
华阳国志巴志疆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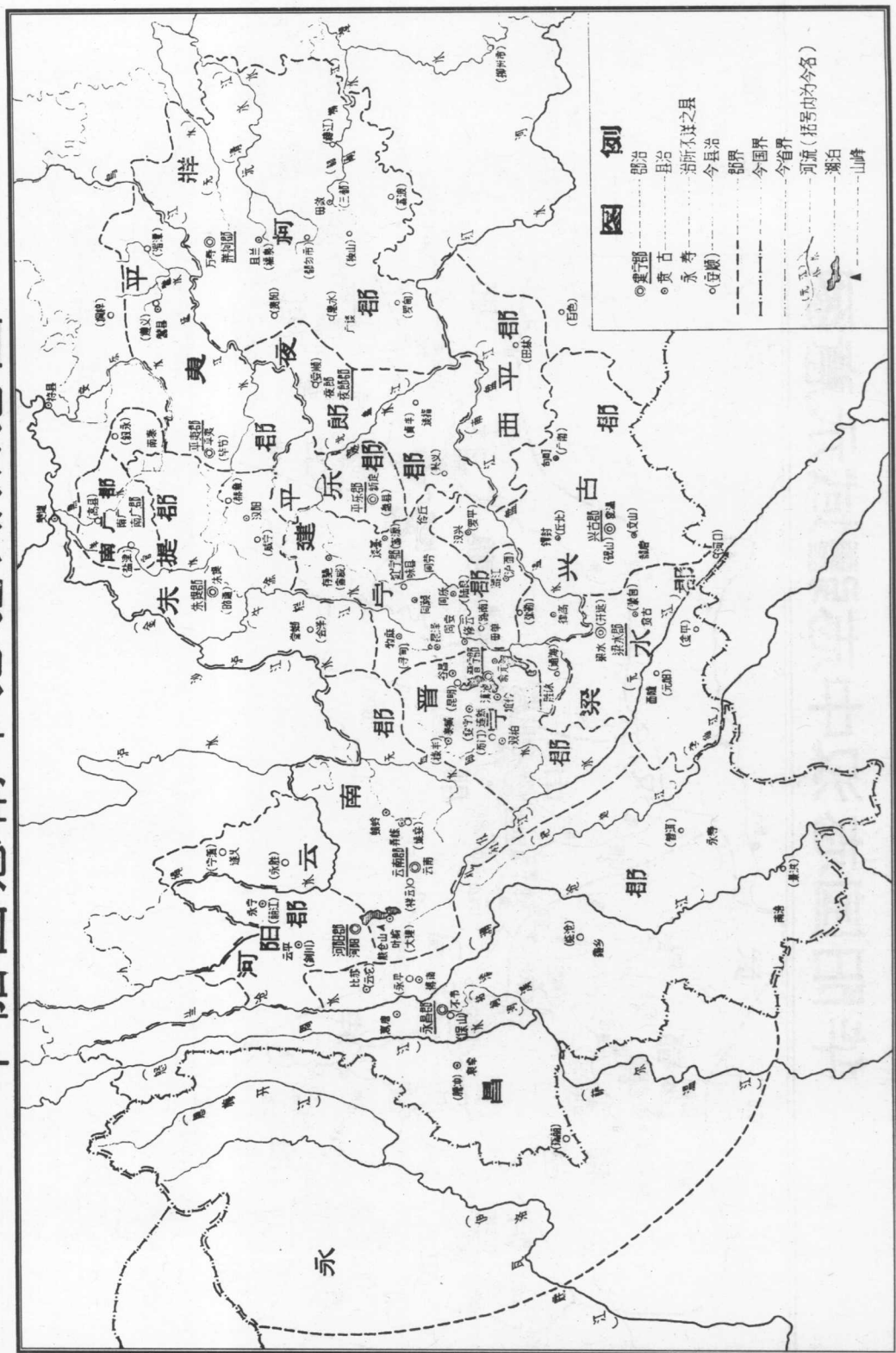
华阳国志蜀志疆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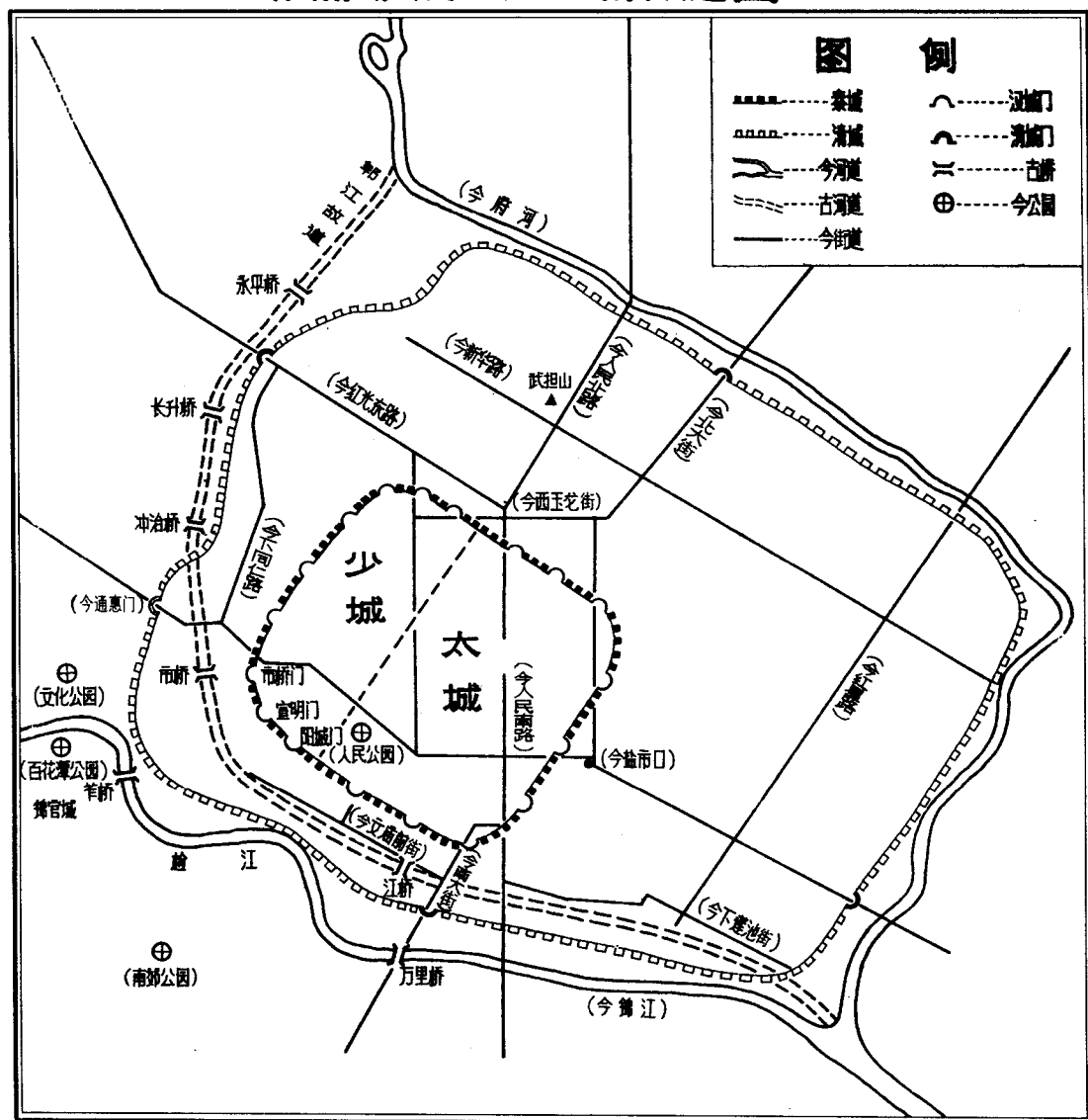
华阳县志汉中志疆域示意图



华阳国志南中志疆域示意图



成都城及二江七桥示意图



修订版弁言

本书的初版是在1984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不久又重印过一次,没想到会销得那样快,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市面上就已经绝迹了。不是我校注得多么好,而是《华阳国志》这部书本身有价值,国内外的广大读者都很需要。例如本书出版的时候,适逢日本东洋大学的学者正在撰写日文本的《华阳国志译注》,因而这本《华阳国志校注》也就很自然地成了他们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这些年经常有朋友建议我再版,我也有此意。不久前通过袁庭栋先生的联系,四川新华出版公司找到我,说他们有意将此书再版,我也就同意了。

本来我与四川新华出版公司约定,此次再版基本上不作修改,只是改正一些错字;但我花了一个月来处理,结果还是改动了不少,成了一个修订版。改动的地方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释当中的历史资料,原来解释太简略的有所补充,原来未引用原文的适当增引原文。例如关于汉中郡地春秋战国之世迭为秦、楚、蜀占有,关于南郑旱山,关于古蜀传说,关于蜀王子征服安南,关于彭阙,关于峨眉山并非“两山相对如蛾眉”,关于“摩沙夷”,等等。

一是原来注为“不详”的现在补充注释。例如西汉牂柯太守吴霸,原注“生平不详”,今据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补注其生平;“黄石、北地卢水胡”,原注“黄石,地名,不详”,今据《后汉书·任延传》李贤注注明“黄石”为杂种胡人之号;晋荆州刺史宋岱,原未注出其生平事迹,今则广引诸书为之添注。

一是原来注释不确的现予改正。例如蜀汉杜濩传“五经四部”之“四部”,原释为魏郑默、晋荀勖的甲乙丙丁四部(即后世经史子集四部的前身),但汉末孔融、魏文帝曹植都已有“五经四部”之说,在郑默、荀勖之前,说明原来的注释不对,因此实事求是地改注为“不知何所指”。

一是有三处古地名的今释重加解释。成都平阳山,原释为天回山,过于牵强,今据《编珠》之说重释为城东之山。永昌郡南涪县,原释为今瑞丽,谭其骧先

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定于西双版纳，今从之，因为南涪“特产孔雀”，今中国亦惟西双版纳一带产孔雀。朱提郡南秦县，《常志》云：“自楚道（今四川宜宾）、南广（今四川高县）有八亭道通平夷（今贵州毕节）。”我原来将南秦县释为云南镇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同），将八亭道释为“当是自今高县、筠连入云南盐津，经大关、彝良而转镇雄、毕节一路”。现在看来都不妥。既名“八亭道”，必然是一条从宜宾到毕节的驿道（亭即驿亭）；蜀汉时庾降都督曾经驻此（当时叫南昌县）以控制南中（今贵州、云南），也说明此县必在重要的交通要道上。而镇雄僻处乌蒙山腹地，自古至今都不在主要的交通线上。因此我现在将南秦（南昌）拟于今四川叙永以南；而所谓“八亭道”，采纳清人郑珍的意见，释为从宜宾经叙永至毕节之路。这样，或许比较接近于实际。

此外，对词句的训释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对文字的校勘也有一些新的看法。

不过，总的来说，这次的修订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修改。书中的今地名和区划仍然是写书时的地名和区划，书成之后新出的考古文物资料也没有使用（其实能用得上的也极少）。因为这本书毕竟是20多年前写的书，而不是2006年写的书，我想还是基本上保持原貌为好。我在本书的初版前言中曾说：“本书校注的意图是为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本简明的中级读物。”这次的修订，仍然本着这样的意图，维持这样的定性。

时隔20多年，将旧著重读一过，本人的自我感觉居然还不错，颇有“敝帚自珍”、“不悔少作”之感，甚而为年轻时的锐气而窃喜。我想，要是让我现在来写这本书，恐怕是写不出来了。但决非没有遗憾。要注释好《华阳国志》这样内容广博的古代方志，一是需要参考大量的古今文献，二是要多作实地调查，可惜在这两个方面，我当年所获得的客观环境相当的差。本书写于1975年至1980年之间，其时正是十年动乱之末，拨乱反正之初，乱犹未尽，百废待兴，图书馆也还没有完全正常开放。虽然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参考的古今文献不为不广（不下千种），特别是古代文献，该查的差不多都已经查了，但还是有不少书刊借不出、找不到。在公私俱穷的情况下，经费的支持更说不上。记得经过我的一再乞求，学校的一位领导总算格外开恩，同意借给我200元钱，并特别注明：将来若出了书，有了稿费，此款必须归还（后来当然是还了）。幸好有了这200块钱，我才得以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并到四川一些地方作了一点考察，取得了不小的收获。所以至今我还很感激这位领导。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的书，自然缺陷不会少。

这些年很多前辈和朋友,或者在报刊上,或者在我面前,对这本书赞扬的多,批评的少,但我还是更希望看到和听到中肯的批评。

在此修订版即将出版之际,我除了要感谢广大读者的关爱、感谢四川新华出版公司和成都时代出版社的支持之外,还要特别感谢袁庭栋先生。我最初起意写这本书,就是由他促成;以后他又是本书的责编,对本书提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这次的再版,又是他在中间牵线搭桥。对于他始终一贯的热心鼎助,我再次表示谢意。

刘 琳

二〇〇六年十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第一版前言

—

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以下亦简称《常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灌县旧志谓常道将废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县太平公社一带,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无可考,生平事迹史书记载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学,后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孙盛称之为“蜀史”。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作创造了条件。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桓温伐蜀,常璩等劝李势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①大概后来在东晋王朝不甚得到重用,或为中原、江左的士大夫所排摈,因此他在《华阳国志》中每每借题发挥,牢骚溢于言表。

常璩的著作除《华阳国志》外,尚有在成汉时写的《汉之书》十卷,记成汉历史;后入晋秘阁,改名《蜀李书》。^②此书久已失传,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尚引有佚文数条,其中称李雄为“武帝”、李班为“哀帝”,可证其写于李势时无疑。

《华阳国志》最初也叫《华阳国记》。^③《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意即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极黑水之滨。《常志》所记地区属《禹贡》九州之梁州,故取“华阳”以为名。

《华阳国志》所载,“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其成书时间在永和四年秋以后至永和十年之间。以其卷九云:“永和三年(李玘)从征西于山阳战死。”“征西”指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按《晋书·穆帝纪》:永和四年八月,进安西将军桓温为征西大将军。故知《华阳国志》的写成必在永和四年八月以后。又卷二载:晋成帝咸康四年,武都氏人杨初杀氏族首领杨毅、杨盘兄弟,“代为

主,迄今”。考《晋书·穆帝纪》,杨初死于永和十一年正月,可证《常志》成书必在永和十一年正月之前。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其内容大体上是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我国方志之作,萌芽于春秋,始盛于东汉。相传孔子见“百二十国宝书”,或即方志的权舆。及“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一时形成风气。^④在《华阳国志》之前,各地方志见于记载的已达一百多种,或记述方国的历史,或记载州郡的地理,或叙论乡党的耆宿。而益州地区(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风尤盛,方志可考的就有二十余种,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其中有八家《蜀本纪》、来敏《本蜀论》、常宽《蜀后志》等历史之书;有谯周《三巴记》、黄容《梁州巴记》等地理之作;有三家《巴蜀耆旧传》、祝龟《汉中耆旧传》、二陈(陈术、陈寿)《益部耆旧传》等人物之志。

这一大批著作的传播,为更加成熟的方志的写作开创了风气,准备了材料,积累了经验。常璩正是在广泛吸取三州各种方志材料的基础上,参考《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全国性的历史著作,再加上成汉政权的档案资料以及亲身的所见所闻,才有可能写出《华阳国志》这样内容丰富的著作。因此我们说,《华阳国志》是中国方志编纂学发展的产物。

但是另一方面,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他看到了上述方志的一个共同的缺陷: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各写一面。这样就只能各自反映地方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不能反映它的全貌。于是,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即我们前面说的历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两个“三结合”。这就使《华阳国志》一书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示

出祖国西南一方上千年间历史的概貌。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可惜在《华阳国志》之后,中历南北朝、隋、唐,这种体裁没能得到发展,绝大多数的方志著作仍然沿袭东汉魏晋的余绪,史、地、人分家,极少综合之作。这里有传统的影响、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度,对乡里的人物、历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也与作者的学识有关。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编纂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著作取材更为广泛,分门更为详密,奠定了明清以来一般方志的体例。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本溯源,《常志》实开其先河。

我国的古方志,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达二千一百七十五种,现存者已不到七十种;隋以前的除《华阳国志》外,更仅存十来种。这十来种之中,有的真伪杂糅,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内容狭窄,其价值都是远逊于《华阳国志》的。因此这部书可说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的硕果仅存者。但它并非仅以其古其稀而取胜。试观明清以来的方志,虽则浩如烟海,但是像《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并不多。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二

《华阳国志》之所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尤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这里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绩,各县的大姓,等等。它为西南地区古代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在有些方面,其价值超出了西南一隅的范围。下面略举数例。

(一)关于汉晋西南地理沿革。这方面虽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及其他一些记载可资参考,但诸

史地理志大抵仅列郡县名称,而于沿革及位置或未加说明,或语焉不详。特别是由于《三国志》没有地理志,晚出的《晋书》又大体只反映晋初的政区而且讹误不少,以致后人对蜀汉两晋的地理沿革每觉不甚了了。幸而《华阳国志》对西汉以来的郡县沿革和治城所在记述比较具体;且常璩以蜀人说蜀中及邻区的地理,一般来说,自较外地著作更为可靠。因而这部书也就成了考证古代尤其是蜀汉、西晋时期西南地理的一部主要史籍。唐宋以来的地理书在这方面有很多错误,推其原因,往往是由于忽略了《常志》的记载。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点说明,即《华阳国志》的地理部分资料比较庞杂,它并不是根据某一特定时期的版籍写成的,因而它也不是反映某一特定时期的行政区划情况。这与一般正史的地理志是不同的。比如梁益二州所载的一百一十个县,有十八个县为晋以前所置而晋代已废。其中,有的在本书中已注明某时省;有的虽未注明,但根据其他记载,可以肯定早已省并。这就证明,《常志》所载并非完全是晋朝某一时期的区划。盖此书之作,原非止于记录当时的政区,而是为了说明历史的沿革,故而除了到永和三年为止晋王朝的图籍上所有(不一定是实际占有)的郡县之外,昔日曾有、而今所无的县,也多收入(不是全部收入)。另外,《常志》大部分郡下均载有晋户数 and 距洛阳的里程。其户数大抵较《晋书·地理志》所载为多。如永嘉以前的十六个旧郡户数,《晋志》不到二十三万六千,而《常志》为三十四万五千,几乎多三分之一。众所周知,《晋志》是依据太康前期的版籍,则《常志》所据资料应在之后。从三州的政治形势看,到惠帝元康年间为止较为稳定,民户的增殖也应以此时为最多,元康六年梁益二州由轻州改为重州,与此有关。因此《常志》所载当是元康中的户数。不过也不尽然,如宁州永嘉以后所设新郡户数当为刺史王逊时的情况。至于《常志》所载各郡去洛阳里数,可以肯定是西晋图籍。因为在三十三郡之中,惠帝永兴元年以前的旧郡全部载有去洛里程(与《续汉志》大同小异),永兴后的新郡则概无记载,可证其所据为永兴前的资料。总而言之,我们在使用《常志》的这类地理资料时,应作具体分析,否则容易造成错误。

(二)关于政治史,《华阳国志》一至四卷中也有不少重要材料。试以巴、蜀古代史和诸葛亮征南中为例。巴、蜀地区先秦的历史,在《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只有东鳞西爪的记载,使读史者为之茫昧。《华阳国志》